

从汉墓明器看汉代农业经济

□ 朱顺龙

一、前言

明器是我国古代专为殉葬而仿照实物制成的殉葬品和各种器物,如灶、盆、壶、案、杯、化妆盒、饮食用具、家具、农具、手工用具、钱币、珍宝、水田池塘、车、船、各种人与动物俑、建筑模型等。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深受儒家厚葬思想的影响,故成为出土明器数量最多种类最全的时期。明器是死者生前生活的真实写照,是最能直观反映社会现实的资料,对它们的合理使用,可以大大弥补文献资料的不足。目前对汉墓明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探讨它的文化根源,以及其与儒家思想的关联。本文试图通过对汉代明器资料的分类考察,结合反映汉代社会历史发展的文献资料,两者相互印证,初步探讨汉代农业经济的发展基础和现状。

二、明器是对现实生活的直接模拟

“明器者,冥中所用之器也”^[1],故明器又被称着冥器、盟器。自夏以来,凡生人所用之物,皆一一制为冥器,送之墓中,以备死者之用;明器是原物按比例缩小的随葬品,事实上没有什么实用价值,只为表达心意。孔子云:“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2]。明器是古代人们对死后生活“猜测后经艺术加工的模仿,形成了自己的文化现象,它不单纯是一件随葬品,而是‘灵魂不死’的思想观念的产物,本身承载了古人的思想意识和思想方式,反映了历史各个时代的风俗特征、生活面貌,是我们研究古代文化的重要媒介之一。

在汉代,儒学思想成为汉代社会的统治思想,儒家在注重伦理道德时,把“孝”又作为伦理道德之首。“举孝廉”制度便是这种思想的产物——将奉行孝道变成人们升官发财的必要条件。社会上把葬礼的厚重程度作为评判“孝”的一个尺度,出现了“以厚葬为德,薄终为鄙”^[3]的现象,推行厚葬之风越来越盛。东汉,明帝永平十三年诏曰:“生者无担石之储,而则力尽于坟上”。《礼制·檀弓》曰:“其曰明器,神明之

也。”又曰:“仲宪言于曾子曰:夏后氏用明器,示民无知也;殷人用奠器,示民有知也;周人兼用之,示民疑也。曾子曰:……夫明器,鬼器也;奠器,人器也。”无论墓葬中使用何种明器,其思想根源都在于古人“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4]的忠孝礼制丧葬观,这些明器随葬的目的主要是提供墓主之灵在阴间生活所需。正如马克思所说:“生前认为最宝贵的物品,都与已死的占有者一起殉葬到坟墓中去,以便他在幽冥中继续使用”^[5]。

由于儒家“事死如生”观念的影响,加上社会经济的发展无法满足“厚葬”的相对需求——无法真实重现死者生前拥有的财富,明器就成了现实生活中各种各样事物的替代品。它既可以满足地主庄园式经济条件下必然存在的事物的实际需要,又不必浪费太多社会财富。明器是对生活中日常使用的事物形象的直接模拟,明器的形象即来自生活。自商周以来,这种模拟的能力又不断提高。所以除去一定程度的抽象和艺术加工,研究明器,就是研究现实事物。

三、汉代经济概况

汉代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特别是铁器的制作和使用的逐渐推广,使得社会生产力得到极大的提高,社会生产关系也发生了崭新的变化^[6]。汉代农业生产迅速发展。除中原传统农业区域外,边远地区的农业开发也有长足进展。随着水利事业的发展,耕地面积不断扩大,铁制农具的种类和数量逐渐增多,使用地区更为普及。牛耕技术不仅在中原地区普遍采用,而且推广和传播到了边远地区。一些新的耕作方法,已开始逐步推行。此时我国古代农业生产达到很高水平,精耕细作的生产传统已形成,古代农业科学知识开始系统化和理论化。这时期所取得的农业成就,在我国历代文明发展的辉煌史册中,记载了重要的一页^[7]。

这一时期完成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在全国的最后确立。地主土地所有制从商鞅变法后已经出现,

但到秦末汉初土地买卖才是地主兼并土地、发展地主土地所有制的主要途径。地主土地所有制在全国确立以后,就必然出现董仲舒所说的那种“民得买卖,富者田近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9]的两极分化现象。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必然导致了财富的积累和两极分化。地主、豪强经济势力渐长,形成庄园式经济的局面。

四、从明器看社会现实

汉代明器种类大致可以分为:建筑明器、交通明器、生活用品明器等三大类。本文研究重点主要是以下几类明器:建筑明器(陶屋院、陶楼、陶楼院);田地、池塘模型;仓、灶模型;家畜、家禽、畜圈等等。

1. 建筑明器

建筑明器最起码应该在西汉初期即已出现,且已经发展到较为成熟的阶段^[10]。

建筑明器一般是仿生前建筑烧制,是墓主生前部分建筑财富的代表。郑州南关 159 号汉墓出四合院式陶住宅模型,由门房、仓房、阙、正房、厨房、厕所和猪圈等六部分组成一所四合院式的住宅。大门向北,门两侧为门房,门房之东置一座高大的阙。与门房对应处为正房,院右侧为一仓房,左侧为一厨房,正房两侧设有厕所,厕所之下为猪圈,圈四面有围墙,内有一伏卧的陶猪。厕所房顶置有鸡和鸡雏 8 只。厨房门前置一陶灶,门房内放铜甑、铜洗各 1 件。陶狗置四合院中央,头向门外,作昂首伏卧状^[11]。这是西汉晚期一般中小地主的墓葬,这座随葬的地主庄园模型也正反映了当时中小地主阶级庭院布局和家庭经济生活面貌。

汉代地主庄园式经济的特点,决定了他们拥有多个相对较为独立的“建筑单位”。除了按礼制要求的生活建筑(这种按照礼制生活的要求,早在殷代就是如此^[12]),又有满足自给自足生活要求的各种各样数目不等的生产性建筑,以及为了安全生活需要的防御性、娱乐与防御性相结合的建筑^[13]。大多出土陶楼、陶院等建筑明器,都在楼、屋周围筑以围墙,或以池代垣,有的还建有角楼、望楼、飞桥等设施。加之院内地主昂首端坐,一派高楼深院的庄园场面,不仅揭示了地主阶级的骄奢淫逸生活,而且也可看到家臣登高远眺或下瞰,武士执兵器武装护卫,严阵以待。这些堡垒式的建筑不但具有明显的防御性,更是豪强地主剥削和镇压农民的阵地,再现了当时阶级对立的尖锐和以庄园为据点的豪强地主各自

为政,独霸一方的情景。

在四川出土的一些东汉残碑(相当于地主家庭中分家析产的“分书”),有助于我们认识汉代庄园式经济下的庄园式建筑。如《郑子真宅舍残碑》云:(上缺)所居宅舍一区,直(值)百万。故郑子真地中起舍一区,作钱(缺)。故郑子真舍中起舍一区,七万。故潘盖楼舍并二区,十一(缺)。故吕子近楼一区,五万。故象楼舍一区,二万五千。(缺)扶母舍一区,万一二千。(缺)凤楼一区,三万。(缺)车舍一区,万。(缺)奉楼一区,二万。(缺)子信舍一区,万。^[14]其他残缺部分还记载有某某舍宅、奴婢、财物等,都是属于一家大地主所有。由于碑残,其全部财产当不止此数,可见其建筑分区之多。

2. 田地、池塘模型

汉代官僚、地主豪强将生前占有的田地作成模型明器随葬,作为产业和财富的象征,是前所未有的。在四川、广东、云南、陕西、河南等地都有出土田地、池塘模型。四川绵阳水田模型,田中 5 人,其中 1 人为监工,双手插袖,站在中央,另 4 人身材相对矮小,俯身作各种劳作形象。佛山澜石 14 号汉墓出陶水田附船模型 1 件^[15]。田面呈横长形,上面被田埂分成六方,其中一方有一监工;其余五方,每方内有一俑操作。水田右后方停放小船一只,供农民上下田乘坐或作运送粮食和肥料的交通工具。这种田间有监工的大面积耕作场面,看来不是一家一户的租佃制生产方式,而是劳役制的耕作形式,表明了当时剥削方式的落后。

云南昆明呈贡七步场汉墓出土陶水田模型,蓄水池中有莲花、鸭、青蛙、螺蛳、乌龟等动植物。贵州兴义 8 号汉墓出土水塘稻田模型 1 件,一半为水塘,一半为稻田。水塘里有鱼、荷叶、莲蓬、菱角、荷花等动植物。陕西勉县老道寺 1 号汉墓出水田模型 1 件,田面中放置有 18 件泥制的荷花、荷叶、莲籽、菱角、浮萍、鳖、鱼等小型水生动植物。2 号墓出土池塘水田模型 1 件,池塘与水田连为一体,塘内塑有螺蛳、蛙、鱼、鳖。3 号墓出池塘模型 1 件,塘内塑有螺蛳、荸荠、莲花、鳖、蛙等水生动植物^[16]。4 号墓出陶冬水田和水塘模型各 1 件,水田模型有泥塑蛙、鱼、螺蛳、菱角等,水塘内一角塑青蛙 1 只^[17]。它们体现出当时农产品的丰富以及水田农业的勃勃生机。这正是当时水利灌溉和农业生产以及经济发展的真实写照。

水利灌溉是农业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汉代十

分注意维修和完善旧有水利设施的工作。汉文帝时,蜀郡太守文翁穿湔汉口,溉灌繁田千七百顷^[119],使著名的都江堰水利工程进一步发挥作用。战国末期关中地区开凿的郑国渠,灌溉效益十分显著。汉武帝时,又在郑国渠上流南岸增开了六道支渠,以辅助灌溉,号称“六辅渠”^[119],使郑国渠的灌溉面积进一步扩大。东汉时期,有关修理旧渠的记载甚多,如:“修理铜阳旧渠,百姓赖其利”^[120]、“修理西门豹所分漳水为支渠,以溉民田”^[120]、“诏三辅、河内、河东、上党、赵国、太原,各修理旧渠,通利水道,以溉公私田畴”^[120]、“修理太原旧沟渠,溉灌官私田”^[121]等等。不仅如此,汉代开凿的新渠数量也甚多,分布极广。其中最著名的是汉武帝时开凿的漕渠和白渠。同时,兴建和修复大型水库,广泛利用小型陂池水田,凿井灌溉等举措,也在汉代取得了突出成就,使水利事业迅速发展,促进了农业生产进步^[122]。

3. 仓、灶模型

西汉前期,陶仓、陶灶在西安等关中地区已经出现,特别是大型墓葬中陶仓成为必备的随葬品。西汉中期,特别是宣帝以后,伴随着土地兼并与财富的急剧集中,仓、灶模型,在关东,乃至南方地区也都相继出现,并逐渐流行于全国^[123]。它们与井、灶等组成一套模型明器,逐渐代替传统仿铜礼器鼎、罐、壶、盘、匜等随葬。洛阳烧沟汉墓群中,共出土陶仓983件。在西汉中期墓中,陶仓模型普遍出现,一般每墓5件。到了西汉晚期,陶仓模型数量大增,一般每墓5~10件,最长达19件。许多陶仓在出土时盛有黍、稻、粟、大豆等农作物的外壳,有些仓外壁还涂有粉、朱等色,题记“稻种万石”、“大豆万石”、“大麦万石”等文字^[124]。在南阳新野樊集西汉中晚期汉画像砖墓群中,共出土陶仓77件,每墓3~4件,多者5件^[125]。在南阳一些较大型的汉墓中,出土陶仓达6~10件^[126]。到东汉前后,仓已是常见的随葬品,这时不仅有了囤和单层仓房,在中原地区还出现了建造结构十分复杂的仓楼模型。楼层不等,一般为两层,也有四层、六层、七层的。典型的有河南密县后土郭1号汉墓出土陶仓楼^[127],焦作市西郊东汉墓出土的彩绘陶仓楼等。

在汉代,少量的粮食一般储存在罐、壶、瓮等容器里,大量的粮食才储存在仓里。汉代庄园经济发达,汉墓中随葬的仓和出现于壁画、画像砖石中的仓,都是豪强地主庄园粮仓的缩写,他们把从农民手里剥削来的大量的粮食储存在里面。在上述密县

后土郭1号汉墓出土的陶仓楼正面还绘有地主收租图,两侧面绘有守卫粮仓的士卒。在密县打虎亭1号画像石墓的南耳室的南壁上,也有一幅大型收租图^[128]。画中有高大的重层仓楼,楼上有人执弓弩守卫,楼梯上有人背粮攀梯,楼前有纳粮验收、装袋和监视等人物活动场面,生动地再现了汉代庄园地主收租入仓的情景。汉代农业经济繁荣,粮食连年丰收,人们建造了各种形式的仓房、谷囤和仓楼来储藏粮食,以备凶荒,反映了汉代人重积贮的思想。

4. 家畜、家禽、畜圈

家畜模型在西汉早期已经出现,西汉后期开始出现家禽和猪圈。西汉早期墓葬发现的动物明器,其中包括:马22件,牛10件,猪3件,狗10件;西汉晚期墓葬发现:马1件,牛6件,猪(圈)6件,狗6件,鸡4件,鹅4件,羊4件,鸳鸯2件,天鸡1件^[129]。从这组数据的对比中可以看出,西汉早期的畜牧业以役畜为主,晚期以肉畜为主。这与当时的社会现实有很大关系。

秦末汉初的社会动乱,造成了社会经济的凋敝,畜牧业正常发展的条件遭到破坏。整个中原地区马匹奇缺,西汉政府的军马严重不足,甚至出现“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的状况。为了扭转这种局面,西汉政府在边郡大力发展官营牧场——牧师苑,同时也在内郡广建官马廄,并且采取了其他一些鼓励民间养马的措施。经过几十年时间,养马业得到了迅速发展。到汉武帝时,出现了“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130]的景象。据《汉旧仪》记载,京城长安附近有“天子六廄”,各廄“马皆万匹”;边郡牧师苑三十六所,分布北边、西边,以郎为苑监,官奴婢三万人,分养马三十万头,择取教习,给六廄。牛、羊无数,以给牺牲”。太初三年(前102年),汉伐大宛时,一次即出动“牛十万”来运送军用物资,说明当时官养役牛数量也有较大增长。民间养马业和养牛业也获得了相当的发展,在边郡出现了大规模的私人畜牧经营。所谓“长城以南、滨塞之郡,马牛放纵,蓄积布野”^[131]的说法,充分反映了边郡养马和养牛业的兴旺景象^[132]。

西汉晚期至东汉末,出土动物明器以肉畜类动物为主。据统计,全国各地共53座墓中,共42座出土鸡明器,41座出土狗明器,40座出土猪明器,12座出土羊明器,而牛和马的比例大大减少,9座出牛明器,8座出马明器^[133]。显然,畜牧业的结构发生了改变,从以役畜为主转变为以肉畜为主。其原因主要

有两个。一是由于马牛主要用于役使,且秦汉政府为保护役畜亦时常颁令严禁屠宰马牛,羊产区还不普遍等原因,所以就中原地区一般农家来说,肉食的主要来源乃是鸡和猪^[34]。二是当时封建政府大力提倡饲养畜禽。早在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文集中就有很多关于劝民饲养家畜家禽的记载。《孟子·梁惠王上》:“鸡、豕、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孟子·尽心下》:“五母鸡,二母彘,无失其时,老者足以食肉矣。”极力主张百姓饲养家畜家禽作为肉食来源。汉政府承袭这些指导思想,也大力提倡养鸡养猪。

总之,随着汉代经济的高度发达,以猪、狗、鸡等饲养为主的家庭副业也迅速发展起来,并成为这一时期百姓家庭的经济模式及富裕生活的一个重要标准。汉墓出土的大量陶家畜家禽模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汉代的经济发展水平。

汉代墓葬中大量明器的出土,与文献资料互相印证,大大丰富了我们对于汉代家庭生活和农业经济的认识。从建筑明器中,我们不难看出汉代地主阶级的骄奢淫逸的生活,以及当时阶级对立的尖锐和地主豪强各自为政、独霸一方的情景。仓、灶模型是汉代粮食充裕经济繁荣的最好证明。田地池塘模型从侧面反映出了当时水利事业的发达以及农业的迅速发展。从动物模型可以清晰地看出汉代畜牧业由役畜为主到肉畜为主的过渡过程,也展现了当时百姓家庭副业的繁荣景象。

[1] 尚秉和等点校《历代社会风俗事物考》,中国书店出版,2001年1月。

[2]《论语·为政》,《十三经注疏》下册,中华书局,第2562页。

[3] 范曄《后汉书·光武帝纪》,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51页。

[4] 范曄《后汉书·显孝宗明帝纪》,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15页。

[5] 参见《礼制·中庸》。

[6] 马克思《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

[7] 陈旭《郑州商城宫殿基址的年代及其相关问题》,《中原文物》1985年第2期。

[8] 林剑峰《秦汉社会文明》,西北大学出版社,1985年9月版,第44页。

[9] 参见《汉书·食货志》。

[10] [13] 周学鹰《汉代建筑明器探源》,《中原文物》2003年第3期。

[11]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郑州南关159号汉墓的发掘》,《文物》1960年第8、9期。

[12] 如陈梦家先生在《殷墟卜辞综述》一书中根据甲骨文资料和考古资料,分析殷墟的建筑布局时指出,除宗庙建筑以外,还有寝是居住的建筑,是宴享之所,大室是治事之所等。

[14] 张勋燎、刘磐石《四川县东汉残碑的性质和年代》,《文物》1980年第4期。

[15] 广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广东佛山市郊澜石东汉墓发掘报告》,《考古》1964年第9期。

[16] 郭清华《陕西勉县老道寺汉墓》,《考古》1985年第5期。

[17] 郭清华《陕西勉县老道寺四号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2期。

[18]《华阳园志·蜀志》。

[19]《汉书·仇宽传》及颜师古注。

[20]《后汉书·何敞传》。

[21]《后汉书·安帝纪》。

[22] 林剑峰《秦汉社会文明》,西北大学出版社,1985年9月版,第51~52页。

[23] 李如森《汉代丧葬礼俗》,沈阳出版社2003年6月第1版,第142页。

[24]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考古发掘队《洛阳烧沟汉墓》,科学出版社,1959年。

[25] 河南省南阳地区文物研究所《新野樊集汉画像砖墓》,《考古学报》1990年第4期。

[26]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南南阳杨官寺汉画像石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3年第1期,第128~132页。

[27]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密县后士郭汉画像石墓发掘报告》,《华夏考古》1987年第2期,第120~121页。

[28] 安金槐等《密县打虎亭汉代画像石和壁画墓》,《文物》1972年第10期,第49~53页。

[29] 数据来源参见《汉代丧葬礼俗》第149页。

[30]《汉书·食货志》。

[31]《盐铁论·西域篇》。

[32] 林剑峰《秦汉社会文明》,西北大学出版社,1985年9月第1版,第60页。

[33] 数据来源,参见《汉代丧葬礼俗》第149~152页。

[34] 林剑峰《秦汉社会文明》,西北大学出版社,1985年9月第1版,第61页。

(作者工作单位:复旦大学文博系)